



莫让百姓再当“化学家” ——代表、委员热议食品添加剂

最近，老百姓熟悉了一个本来十分生僻的字母组合：OMP。这种添加在蒙牛特仑苏牛奶中的食品原料被疑致癌，一度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最终卫生部证实它对人体无害，但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忧思远未终结。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有害食品添加剂曝光，人们无奈地发现，自己熟悉的化学名词越来越多：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面对泛滥的食品添加物，人们倍思回归自然。

能否让百姓不再兼任“化学家”？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专访了卫生部、蒙牛乳业、有关专家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

OMP 被判定“安全” 但反思仍将继续

近期以来，蒙牛公司特仑苏牛奶中 OMP 安全性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卫生部随即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此进行论证，结论是：OMP 牛奶不会对人体造成健康危害。

“压力很大。”蒙牛集团总裁杨文俊这样形容这段时间的心情，“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及时论证，帮助蒙牛和 300 万奶农渡过了难关，但集团上下都在反思这个深刻教训。OMP 没问题，不等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没问题。本来是个好东西，但不规范运作却给自己带来了危机。”

卫生部认定，OMP 是未纳入我国现行食品卫生标准管理的食品原料。根据有关法规，蒙牛进口、使用这种原料，要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显然，蒙牛没有做到。

起初，蒙牛认为 OMP 来自牛奶又加入牛奶，还有国外食品安全机构出具的证明，当然安全。然而，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指出：“凡是食品都要格外谨慎，即使食品提取物，在提取过程中，由于加温、加压、助剂等作用，也可能产生质变。牛奶的营养成分本有固定配比，添加物改变了配比平衡，会不会对人体有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企业主动加强安全性研究，并经国内权威机构验证，而蒙牛却缺失这方面的程序。”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红思考的是“标准”问题。她说，OMP 风波之初，连这种物质究竟该怎么归类都不知道，说明相关研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食品管理规范、标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专家也遭到了代表委员的批评。在许多食品企业的产品推广中，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帮着企业大肆宣传，最后成了“信任危机”的推手。谢红代表认为，要对这些人加大管理力度，不能任其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误导消费者。

食品添加剂已经到了 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蒙牛 OMP 涉险过关，但人们不禁追问：像 OMP 这样长期未被有效监管的食品添加物还有多少？在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人们“谈食品添加剂色变”，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有着切身体会。

“食品添加剂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谢红代表曾到一个食品加工企业调研，发现企业为

了食品的色香味超量使用添加剂。她曾问企业老板：“你们不怕吃坏了人啊？”老板说：“我们自己不吃这些东西。”谢红代表说：“我当时很寒心。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吕秋娥说，有一次她在某渔村钓鱼，得知渔村给鱼喂抗生素。吕秋娥代表说：“长期食用这种含抗生素的产品，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危害不比三聚氰胺小。”

“面粉里面有荧光剂和增白剂，大米经过了化学漂白，蔬菜水果上喷洒了保鲜剂，存放了很久的肉经过化学品浸泡可以恢复新鲜的色泽……”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国家药物临床实验机构主任黄峻说，“现在我国食品生产领域中使用的添加物确实是过多、过滥了。”

苏志提醒人们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是随着现代食品工业发展而产生的一类物质。现在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是添加剂本身的错，问题在于一些企业违法或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物质。”

从去年末开始，卫生部等九部门开展了联合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整治行动。苏志介绍说，行动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三聚氰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是添加剂不科学使用，或者滥用添加剂，比如超量使用或者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教授储大同说，由于目前食品添加剂太多，研究者也很难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不该加的东西被添进了食物中，也不知道添进去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所以目前关于食品添加剂与疾病相关度的研究还很有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基本是好的，20 年前食品合格率只有 50%，现在达到 90% 以上。但存在的问题很多，有的还很严重。在经济转型期，食品行业存在大量小企业、手工作坊，企业不守规矩的情况还会存在。

既要加强监管 也要企业诚信自律

据苏志介绍，国务院已经部署了为期两年的食品安全整顿，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使用和监管做出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

“诚信需要法律保障。”谢红代表认为，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理顺了监管体制，但是一定要加强执法，执法不严就会流于形式。各部门需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监管工作要真正从百姓利益出发，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不能因为一些企业对地方税收贡献很大，就对违法违规者“手软”。

吕秋娥代表提出，落实食品安全法，还需要很多配套细则，务求实效。不能以罚代管，对一些大企业，一点罚款对他们来说伤不了筋骨。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迟宝荣认为，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必须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她发现，一些县级及以下的检验机构缺少必要的检测仪器和设施，专业检验检测人员严重缺乏，即时检测能力差，检验周期过长，检验检测信息不能共享。

之所以会出现食品添加剂泛滥的情况，利益驱动是主要原因。对于食品生产者来说，这些添加物成本很低、容易获得，而且工艺简单。黄峻委员说：“要限制食品添加剂除了法律手段外，还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要强令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在产品外包装上明显标明食品中所有成分。这样从消费者的角度就会有所取舍，一些过度加工食品就会逐渐淡出市场。”

陈君石院士有一个观点：“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他认为，防止食品添加物泛滥，根本上还是应当靠企业诚信和自律。

迟宝荣委员也指出，行业协会力量薄弱，无法引导企业自律，是导致食品添加剂长期失序的重要原因。目前大多数行业协会没有实际的话语权与处置权，老百姓也不认可其权威性。行业协会难以在加强企业自律、提倡诚信经营和自觉抵制假冒伪劣行为方面发挥作用。

对于这一突出问题，民盟中央建议，应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理分权，把一些权力下放给社会，培养企业的诚信意识，建立对消费者负责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电)

校长“官员化”现象引发争议

校长“官僚气”越来越重，“人文气”越来越差，离“书生气”越来越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不久前在两会上炮轰“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现象，连日来引发了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共鸣和热议。

校长“官员化”愈演愈烈

近日，在不同代表团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

“校长的很大精力要花在‘位子’上，坐上校长位子后，基本上就是‘铁交椅’了。有的校长常年不进课堂，更不懂教育规律。”

“以前大学里系主任没人愿意当，因为会耽误专业研究，现在是大家争着当，因为即使再小的一个官，也比教授手里的资源多。当上官员后，项目、资金全有了。”

“一些高校存在‘官本位’现象，不少有学术成就的都提拔当了官。解决不好这样的人才评价体系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高校的发展问题。”……

张志勇代表不久前在两会上质疑“中小学校长官员化”问题之后，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逐渐升温，更多的矛头朝向了高校和

科研单位。

“如今按官阶定级的结果，使不少人千方百计想办法挤进校长队伍，看重的不是校长承担的崇高的社会责任，而是所谓行政级别，把当校长作为解决自己升迁的机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说。

据了解，不久前，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在广州“公众论坛”演讲时就曾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

“人文气”越来越少

在张志勇等代表看来，校长乃至学者的行政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地方在教育局长的任用上，往往不尊重教育工作的专业性，致使一些不懂教育的人走上了教育局长的岗位。这些教育管理者缺乏教育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和科学发展教育方面缺乏动力，往往用管理经济的办法管教育、管中小学，导致教育发展不健康、不科学。

“不可否认，行政管理系统需要高层次人才，但要考虑相关专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

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理工类学科人才就不太适合从事管理工作，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强项。硬上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整天忙管理又管不好，不但没有时间去研究创新，甚至连原本多年的专业也慢慢淡忘。

“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王炳华说，今天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问题，50 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

辽宁宝来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曲宝学代表说，上世纪初那些大学校长，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的角色意识非常清晰，谨小慎微地注重自身行为，努力营造和守卫自由平等的大学文化，处处警惕官本位对大学的入侵。“比如蔡元培先生，他在北大当校长时每天进校门时都要向教工脱帽敬礼，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当今校长的角色定位。”

呼唤“职业化”校长

“人们总认为有学问的就应该有职务。可能学者本人并不想当官，但是社会却以此来评价他们。”王志民代表说，这与某些地区高层次人才找不到更好的施展能力的舞台或许也有关系。

不少代表认为，校长“官员

化”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官本位”和待遇问题作祟。

河北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联群代表说，教授、中小学教师热衷当官，却不热心在学术或教学上有成就，是教育的悲哀。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而优则仕”中国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长期存在。“教师群体的经济、社会待遇低，收入不如行政管理干部也是不争的事实。”陈联群说，当前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还很低，生活环境很恶劣，所以千方百计地争着当校长，因为当上校长就能改变生活上的处境。此外，校长不是教师选举的，只需要向任命机关负责，向机关的领导者负责。而机关领导者又是任命的，他又必须向主要领导负责。曲宝学代表说：“如此下来，校长很难做到‘以师为本’。”

不少代表如是认为——“大学之‘大’，内涵应该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培养人完善人，不断提升人格和道德；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追求学术真理。”

“文化教育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需要大力清除‘官本位’流毒，让校长等文化教育管理者去‘官员化’，走向职业化。”

……

可喜的是，目前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在校长去“官员化”中作出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例如，山东省潍坊市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管理改为由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取消行政级别后，对校长实行职级管理，淡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这个改革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校长级别没了，校外的政务少了，参加会议少了，在社会上的应酬也少了；思考学校的内务多了，深入课堂的时间多了。”张志勇代表说，这一举措，解决了校长职务“只能上，不能下，交流难”的问题。

“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王炳华等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让人才走上仕途并不是尊重人才的最好体现。当下，如何建立与学校发展相适应、与校长成长规律相适应的校长管理制度迫在眉睫。

他们建议国家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集中精力进行科研，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相应待遇和荣誉。同时，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规格和行政级别，回归专业领域内以知识创新能力为主的评价标准，从根本上激励科研人员。

(据新华社北京电)